

中国民间文学简论

——中唐诗歌流派审美研究

薛文礼 宗志平 著



群言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学简论

——中唐诗歌流派审美研究

薛文礼 宗志平 著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文学简论/薛文礼 宗志平 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3

(新纪元文丛,第3辑/徐传武 卜一 主编)

ISBN 7—80080—361—9

I. 中... II. ①薛... ②宗...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6815 号

责任编辑:刘亚华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印 刷: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80—361—9/I·58

总 定 价:1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清代同光体代表人物陈衍和沈曾植,曾提出我国诗歌发展的三次巨变,即所谓“三元”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云:“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沈曾植则移开元为刘宋之元嘉(《海日楼札丛·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七月第一版),二人识见虽不尽相同,但对“中元元和”都十分重视。“三元”说的提出,固然与同光体诗人“不专宗盛唐”(《石遗室诗话》)并在艺术上模仿江西诗派的作风有关。但以创新求变为特征的中唐诗歌,特别是元和诗歌,不甘落盛唐之窠臼,另辟蹊径,体现出“中唐之再盛”(高棅《唐诗品汇·总叙》)的繁荣局面。

宋代赵孟坚《凌愚谷诗集序》云:“文章至唐而体备,其情态宛委,肌理丰泽,腴面密,婉西丽,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贞元至元和而上,李杜韩柳以至长庆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大中以降,琐涩滋过,固一病也,而又浸淫于以俗为雅之流,代表作者或不免是,况浸淫于末流者乎!”(《彝斋文编》卷三)显然,在赵氏看来,贞元以至长庆,均处于繁盛之中。宋代的理学家杨时,更加推尊以元和为首,长庆诗:“诗自河梁以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龟山先生语录》)明代胡应麟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唐诗人之盛的局面:“元和西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今人概以中晚束之高阁。若根脚坚牢,眼目精利,泛取读之,亦足充扩襟灵,赞助笔力。”又:“东野之古,浪仙之律,长吉乐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过人。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诗薮》外编卷四)清

人叶燮对中唐诗的价值和意义作了更高的提炼,他在唐百家诗序中说:“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者也,乃古今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此以断。”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唐诗人及诗歌在后代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中唐诗人的断创造,不仅直接开启晚唐,而且从北宋的江西诗派直到清末近代的同光体诗歌,都多少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对中唐诗歌作深入细致的形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能为我们进一步把握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一些具体可靠的依据,而且能进一步挖掘和丰富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为当今和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前人对中唐诗歌重要性的认识已如上述,为了加深对中唐诗歌的认识,有必要回顾一下盛唐诗歌的发展,因为中唐诗歌是在盛唐诗歌高度繁荣“难以为继”的局面下产生的,如果将中唐诗歌放在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纵向角度上进行考察,则其重要性将会被明显地表现出来。唐代社会经历了近百年的和平安定和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开元、天宝四十多年间,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富强繁荣的顶峰。唐玄宗即位以后,继承了当年唐太宗求贤若渴从谏如流的作风,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使全国迅速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贞观以来劳动人民创作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国力空前强大,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据历史记载,天宝元年,“天下……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户口数较唐初增加了四倍。天宝八年,全国各主要粮仓有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其中以洛阳含嘉仓最多,达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杜甫在诗中写下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太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忆昔》)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记录。由于初唐时期取得对突厥、吐谷浑、高昌、吐蕃军事上的胜利,到开元时期,边患基本解除,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

版图最大的封建帝国。周边属国纷纷依附，外交使者络绎不绝。“声教所及，惟唐为大。”(《旧唐书 贾耽传》)“冠带百蛮，车书万里。”(《旧唐书 玄宗纪》)唐民族的自豪感空前提高。此外盛唐改革科举制度，推行以诗赋取士，为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进入政治舞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唐代文化的兴盛及诗歌的繁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基础上，盛唐诗歌也达到了全面繁荣的地步，在短短五十余年时间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各不相同的风格，投入了诗歌创作的高潮。正如李白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煜。”昌盛的经济文化，强大的国力，不仅开拓了他们的视野，陶冶了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豪爽的性格，而且也滋长了冲破传统追求解放的精神。可以说盛唐一代诗人，怀着宏伟的理想，以蓬勃热烈的情感，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讴歌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盛唐诗人很少有低沉、纤弱和颓唐的情绪，尽管他们也写离愁别绪，也写失意悲慨，也写山水田园，也写纵酒狎妓，但总有一种壮大的气魄。林庚先生曾指出，他们“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爽朗的健康的，永远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光明的展望”，“这些就是真正的盛唐之音了”(《中国文学简史》)。那种追求进步政治理想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以及傲视王侯反抗权贵的精神，乃成为盛唐诗歌的主流。如：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王湾《次北固山下》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登鹳雀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李白《上李邕》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严羽《沧浪诗话》中又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也。”这段话准确指出唐诗歌阔大、明朗、玲珑、自然之美。

盛唐诗人既有一种昂扬的基调，又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如王湾、贺知章、张旭、张说、张九龄之洒脱自然，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崔辅国、常建、丘为之宁静明秀，崔颢、王昌龄、李颀、崔曙之清刚峻爽，王翰、王之涣、高适、岑参、祖咏之壮大雄浑等等，皆情思浓烈，韵味深厚，境界壮阔，骨气峻爽。李白诗的飘逸之气，凝聚了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兼有豪壮雄浑与清新明秀二者之美。杜甫之诗，“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盛唐之诗诸体悉备，皆臻妙境。王维众体兼长，尤工五言绝句，孟浩然五言最美，储光羲工于五古，高适、岑参以七言歌行为佳，王之涣擅长绝句，李颀长于七古，王昌龄有七绝圣手之称，李白长于乐府绝句，杜甫众体兼长，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无不运用自如，而于七律贡献尤其卓著，而且还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诗，为诗歌反映现实开辟了一条方便的途径。

短短五十年的盛唐诗坛，名家辈出，各展风采，杰作如林，光华闪烁，题材丰富，内容充实，风骨峻爽，情思浓烈，气象雄浑，境界壮

阔，韵味悠远；诸种诗体臻于完善，艺术技巧达于圆熟，尤其是诗歌意境的创造，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充分展现盛唐诗歌所特有的美学风貌。盛唐诗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已经达到诗国辉煌的巅峰。然而这一切，毕竟是盛唐人的骄傲。这对于继踵其后的诗人们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极盛难继”的局面，使中唐诗诗人而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是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既要对前人有所继承，又要有新的创造和发展，这才能保持文学艺术健旺的生命力。如果“通”而不“变”，则是纯粹的复古，势必窒息艺术的生命。因此，皎然《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谓：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廐，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变诗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玉璞，……又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焯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后辈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忧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太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宜其戒之哉。

皎然所反复强调的关键在于一个“变”字。盛唐过后的大历诗人中就不乏效盛唐诗人之声吻情性乃至字句者，然其结果却是“诗道初丧”（皎然《诗式》卷四）、“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皎然在当时提出“复忌太过”和“变若造微，不忌太过”的主张，正是看到了当时不得不变的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开、天以后的诗人来说，言“变”谈何容易！他们不得不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寻找一条适于自己时代的诗歌发展的新途径。叶燮《原诗·内编》

曾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说：“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诗歌发展的盛衰更替，也是符合于一般规律的。历开、天巅峰之后，诗歌创作势必会出现一个相对而“衰”的趋势。而如何走出低谷，由衰而转盛，这正是摆在中唐诗人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欲另辟蹊径，就势必付出巨大的努力。叶燮《原诗 内篇》又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或？”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害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曾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能，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比于救焚的拯溺，可不力乎？”不付出艰辛巨大的努力，就难以改弦更张，转衰为盛。

面对困境，中唐诗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尽管他们的诗歌带有奇变的色彩，但毕竟在盛唐诗歌之后开辟出新的途径，创造出新的美学风貌，呈现出中唐之再盛的繁荣局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中唐诗歌流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分化	(1)
第一章 中唐诗歌流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
第一节 政治局势和审美心理的变化	(1)
第二节 纷彩异呈的社会思潮	(10)
第二章 中唐诗人的创新与分化	(18)
第一节 中唐诗人的创新精神	(18)
第二节 中唐众多的诗歌流派	(26)
第二编 大历十才子诗歌审美研究	(31)
第一章 大历诗人群体	(32)
第二章 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态模式与特征	(38)
第一节 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态模式	(38)
第二节 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态特征	(42)
第三章 大历十才子诗歌的审美特征	(58)
第一节 伤感凄凉的审美感受	(58)
第二节 弥散冲淡的审美情感	(60)
第三节 深微细腻的审美品格	(62)
第四节 狭小局促的审美境界	(65)
第五节 萧疏淡远的审美意境	(68)

第六节 气骨顿衰的审美风貌·····	(73)
第七节 精巧工整的审美表现·····	(79)
第四章 大历十才子诗歌的审美理论·····	(83)
第一节 重视风雅比兴·····	(83)
第二节 提倡清丽远韵、逼真巧似的诗风 ·····	(89)
第五章 大历十才子诗歌的审美影响·····	(98)
第一节 开后代诗歌炼饰之风·····	(98)
第二节 开后代诗歌抒发主体心灵之风 ·····	(100)
第二节 开后代诗歌格调渐收渐敛之先河·····	(101)
第三编 韩孟诗派审美研究·····	(103)
第一章 韩孟诗派的组成与审美定向·····	(103)
第一节 韩孟诗派的组成·····	(103)
第二节 韩孟诗派的审美定向·····	(108)
第二章 韩孟诗派的审美创作倾向·····	(111)
第一节 现实视角·····	(111)
第二节 以奇为美·····	(118)
第三节 以文为诗·····	(130)
第三章 韩孟诗派的审美理论·····	(136)
第一节 全新的诗美理想·····	(136)
第二节 强调不平则鸣·····	(140)
第三节 强调苦吟·····	(141)
第四编 元白诗派审美研究·····	(146)
第一章 元和体与元白诗人群·····	(146)
第二章 元白诗派先驱人物的审美抉择元结及《篋中集》 诗人·····	(161)
第一节 诗笔转向描写现实·····	(162)

第二节 讽谕现实的批判精神	(167)
第三节 诗歌审美理论的创立	(172)
第三章 张籍、王建诗歌审美论	(178)
第一节 张籍、王建诗歌的审美内涵	(178)
第二节 张籍、王建诗歌的审美特征	(185)
第四章 元白诗派的诗歌审美理论与创作实践	(190)
第一节 元白诗派的诗歌审美理论	(190)
第二节 元稹、白居易的创作实践	(195)
第三节 酬唱时俗与酬唱诗风	(202)
第四节 元白诗派的审美表现	(208)
第五节 元白通俗诗风的审美影响	(215)
第六节 感伤诗风及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220)
主要参考书目	(240)

第一编 中唐诗歌流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创新分化

第一章 中唐诗歌流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政治局势和审美心理的变化

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唐多种诗歌流派的产生也是如此。我们要想论述中唐诗歌流派的审美特征,就必须对那个特定的时代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要能够尽量地去体会这些诗人的喜怒哀乐及其形成的原因。当然,历史是无比丰富生动的,无论作多大的努力,我们也无法还原历史,我们只能作最大的努力去接近历史的真实,然后再去探讨在这种状态下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我们愈是接近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情况,就越容易触摸到那个时代文人们的脉搏,越容易理解他们的感情,比较准确地把握他们作品中的深层审美内涵。

中唐时代是一个多变的时代。

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盛衰转变的枢纽。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不仅给中原广大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也由此一蹶不振。《开元传信录》描写开元盛世的情形是:“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不可胜校。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安史乱后,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

及关内等几个素称富庶的地区,由于久罹兵患,在叛军与唐军彼此攻防进退的反复践踏之下,变得满目疮痍。对此,唐朝平叛名将郭子仪在上书朝廷时指出:“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是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上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安史乱后的一段时期,历史上曾有过“中兴”的美誉,其实那不过是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的大乱之后,暂时得到苟安的一种满足。尽管社会表面承平,但早已是败絮其中了。不可否认,代宗、德宗、顺宗等人即位之后,也曾有过重振朝刚、中兴王室的抱负,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削藩、平边、抑制宦官等等;一些进步的改革家也曾励精图治,希望救民于水火。但这一切很快都随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倾轧、边患四起而偃旗息鼓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家庭、每个人仿佛是肌体中的一个细胞,自然也要受其影响和制约。下面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一千二百所前的中唐时期,考察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 败治腐败

中唐时期政治腐败的情况,我们只须看一下当时人的议论就十分清楚了。宪宗元和初年,

皇甫湜在《制策》中,分别从帝王、士大夫、宦官将领,以及刑法、理财、选举等方面历数时弊:宦官们“掌王命,握兵权,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将帅“知兵者日寡”,而“怙众以固权位,行贿以结恩泽”;至于“朝廷之号令,有朝出而夕改者;主司之法式,有昨破而今行者”;更有甚者,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致使“疆埸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悉是编户”;朝廷之黑暗腐败,乃至“谏诤之臣备员,不闻其声;弹察之臣塞路,示曾直指。公卿大夫,则偷合苟容,持禄交养,为亲戚计迁除领簿面已”。总而言之,是“法示修明”,

“政示光大”。文宗太和二年,一些大臣在贤良方正科考试对策中,指陈朝政,尤为痛切。撮其大要,第一,指斥宦官专权,宦官“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致使“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第二,指斥方镇横行,“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第三,揭露当时“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执政者“任人唯亲”,这是“自取其灭亡也”,揭露当时剥削残酷,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国家有“土崩之势,忧在旦夕”。

二 藩镇割据

唐玄宗晚年荒淫殆政,委权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李林甫为了杜绝文人通过边功人相之路,建议玄宗任用目不识丁的少数民族将领统兵,掌握兵权。这些人有兵权而无学识文化,决无人朝为相之可能。虽然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但也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今辽西、河北及内蒙古一带,从隋朝建国后以后就开始安排一些内附的少数民族聚居,设置许多州郡。其中主要的是营州、平州、燕州,主要安抚的民族有契丹、奚、突厥,新罗等等。唐朝开国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从高宗武德初到玄宗天宝初一百多年里,先后增设十几个州。这些州郡聚居的主要少数民族,具有民族自治性质,只是由唐王朝派官员来进行统治。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由于迁来不久,又不处在内地,基本上还是本民族聚居在一起,故汉化的程度较慢。据杜牧《樊川集》卷九《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这位秀才“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才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者,击球饮酒,走马射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正是这些没有接受汉族文化的百姓才是安史之乱的社会基础。

为开边拓土,同时也为防备周边少数民族的骚扰,唐王朝在东北和西北设置一些都护府,驻扎重兵。为长期养兵,在没有战争时

这些军队就进行屯田生产,其收入全归该军队所有。时间一长,驻军之地就出现一定规模的居民集居区。再加上原有的居民,节度使所统辖的地域就更广大了。被派往此处统兵的大将在统领军队的同时掌握财政大权,又治理民事,集军权、财权、政权于一身,成为一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边防上设立军事重镇,节度使权力太重,重用蕃将,这是安史之乱发生的远因。而唐玄宗荒淫昏庸,内宠杨贵妃,外宠安禄山,信任高力士,委权李林甫和杨国忠,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是安史之乱发生的近因。

安史之乱从安禄山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范阳起兵始,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正月,叛将田承嗣以莫州降,史朝义被部将李怀仙诱杀,李怀仙以范阳投降止,历时七年多时间。中原地区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相比之下,长江以南地区虽然也曾遭到两次战争的破坏(一次是永王与肃宗之间的战争,一次是上元元年宋州刺史刘展的叛乱),但因战争时间短和规模小,破坏程度不大。所以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南移。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措置不当,任命降将薛松为相、卫等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等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安史叛军中的几位主要大将投降后都握有重兵,统辖一方,而且又在他们长期占领地区任节度使,给以后留下祸根。魏博、卢龙与成德即所谓的“河朔三镇”,是后来藩镇割据的主要策源地。此后二十多年中,藩镇之乱此起彼伏,只不过规模有大有小罢了。当时,实力比较雄厚,节度将帅比较强悍的藩镇主要有六个,即:(一)魏博镇,(二)成德镇,(三)卢龙镇,(四)淄青镇,(五)宣武镇,(六)淮西镇。直到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河北三镇归顺朝廷,才出现暂时的“中兴”局面。但好景不长,只消停了三年左右,到穆宗长庆元年(821),卢龙、魏博、承德三镇又先后发生叛乱。从此,朝廷再也无法控制局面,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了。

三 宦官弄权

宦官乱政,在中国历史上,莫过于汉、唐、明三个朝代。唐代的宦官之祸,肇始于玄宗,发展于肃宗、代宗、德宗,自德宗后而成为心腹之患,一直到唐代之灭亡。玄宗晚年荒淫殆政,宠信高力士,使之参谋政事,宦官势力开始抬头。但玄宗还能够控制高力士。玄宗让其参谋政事,是自愿的主动的,并不是被迫的。肃宗怯懦无能,宦官李辅国扈从灵武有功,还京后便把大权全部交给他执掌,可以左右皇帝,臧指大臣,皇帝则处在被动地位。代宗因自身受李辅国势力之威胁,故用计谋杀了他。但又重用程元振,权势更大于李辅国。其后又重用鱼朝恩,宦官势力日益强大。德宗即位之初,想有所作为。对宦官有所抑制,宦官势力稍有收敛。但因其性猜忌,重用阴险尖刻之卢杞为相,猜忌大臣,转而信任宦官。宦官掌握了京师及皇宫禁卫军的兵权,难以控制。德宗死后,顺宗即位,王叔文曾经想要夺取宦官的兵权,可惜未能成功。其后致力于谋除宦官者只有二人,一个是文宗,一个是昭宗时宰相崔胤,但都没有成功。当朱全忠彻底诛除宦官后,李唐王朝也跟着进入了坟墓。司马光在叙述此事后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很有启发性。他说:“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却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如承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了。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堕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及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彼此炽矣。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预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祚,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他认为,唐代宦官势力到后来之所以完全失控,最关键因素是唐代宦官掌握兵